

龚育之与科学翻译

李晓洁 王蒲生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深圳 518055)

[摘要] 本文系统介绍了著名理论家龚育之先生从事翻译活动的长期历程 (从 1947 年至 1963 年, 甚至更长), 概述了他从本人的大量翻译实践中、从分析研究别人的翻译作品中, 认真总结出来的翻译经验。龚育之先生的翻译思想对于提高科学翻译水平, 端正译风, 克服当前科普翻译“快餐化”、“浮躁化”等不良倾向有现实的针对性和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龚育之 科学翻译 科普翻译 快餐化

[中图分类号] N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57(2013)02-0086-05

Gong Yuzhi and Science Translation

Li Xiaojie Wang Pusheng

(Graduate School at Shenzhen, Tsinghua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55)

Abstract: This essay gives a systematic introduction of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Gong Yuzhi science translation thought. Gong Yuzhi's translation thought is concluded through years of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lots of reading. Gong Yuzhi's translation thought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in today's popular science translation.

Keywords: Gong Yuzhi; science translation; popular science translation; fast food

CLC Numbers: N4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3-8357(2013)02-0086-05

龚育之的科学翻译造诣很高。他曾翻译介绍了许多苏联的科学著作, 这构成了他早年的科学活动的重要内容。但据笔者的最新查阅资料发现, 其实, 龚育之的翻译实践最早始于 20 世纪的 40 年代至 60 年代初, 持续近二十年, 译著之丰, 几乎可称得上是一名“翻译工作者”。除大量翻译实践外, 他还发表了很多

讨论科学翻译的文章, 倡导诸如“忠实原著”、“一字不苟”等译风, 这些对今天科普翻译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龚育之的翻译实践过程

纵观龚育之的翻译活动, 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下面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收稿日期: 2012-09-11

作者简介: 李晓洁,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与产业哲学,

Email: linsa049962@sina.com;

王蒲生,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与产业哲学, Email: wangps@tsinghua.edu.cn。

分别评介龚育之科学翻译工作过程。

1.1 明德中学时期 (1946.春~1948.春)

“五四”运动以后,学习欧美先进文化蔚然成风,中学开设英文课程成为大势所趋,任职教师以欧美留学归来者居多。龚育之在湖南长沙明德中学读书期间,英语成绩极佳。他将在课堂上学习的英文知识灵活运用,高二时他和同班同学雷普文、刘观恩(即郑慧)三人合办了一份手写的英文壁报,每月一期,名为《春耕》(Spring Ploughing),刊头引用过一首英文小诗:

Ploughing deep
While other sleep
And you shall have
Core to sell and keep

在《春耕》中,他们不但刊登自己写的英文短文,还转载一些英语诗歌、歌曲,还请大学朋友用英文介绍一些著名大学的院系、课程设置等情况,很受同学们的欢迎。

1947年,龚育之作为进步青年,积极投入到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中,而对于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则心怀向往。在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龚育之和雷普文在湖南长沙《力报》的副刊上,开辟了一个文学翻译专栏,取名《译文》,每周一期,半个版面。每个星期天,龚育之和雷普文都一起忙碌,为《译文》定稿。翻译的作品,主要是龚育之从《苏联文学》月刊英文版(Soviet Literature)上选译的^[1]。龚育之使用过黄非、殷红等笔名,翻译发表了《啊,船长!我的船长!》、《莫斯科》等文章。

1.2 清华大学时期 (1948.9~1951.4)

1948年,龚育之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学习。大学里很多教本都是英文版,一些英文教科书的中译本翻译得很糟糕,学生们只有中英对照才能看懂。龚育之在学习L.Pauling原著以及薛德炯、薛鸿达翻译的《普通化学》时,通过与英文原版对照,发现了很多翻译错误,于是撰写了《评薛译〈普通化学〉》一文,批评译者的“粗枝大叶”,认为“给教科

书中译工作的威信带来损失”^[2]。龚育之在化学系一年级同学中作了一次调查,“十二个填调查表的人中,只有两个人填‘看原文书不感到困难’,其他十个人都‘感到相当困难’”^[3]。因而,龚育之在《对教科书中译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中,疾呼“如果大部分的教本能用中译本代替原本,那该是一件多大的功德”^[3]。认为译者要端正态度,并指出要做好教科书的中译,只是多想想多花一点时间的问题。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大批苏联专家、俄文资料涌入。国家紧急组织了一批批俄语短训班。正在读大二的龚育之,将第二外语德语改成俄语^[4],教课老师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在中国机构的工作人员吉利洛夫,龚育之选修过他在历史系开设的苏联史,还旁听过李湘崇先生或龚人放先生的俄文课。

当时学俄文在清华已成热潮,从龚育之《俄文学习在清华》一文中,可以略窥当时俄语学习的盛况:“每天早上,我们的俄文教室里都挤满着人,有历史系的,也有电机系的,有助教讲师们,也有带黑边眼镜的教授先生们。”^[5]龚育之以极高的热情学习俄文,不同于英文的发音,变化多端的文法,都没有挫掉他学习俄文的锐气。

1950年,龚育之在《文艺报》上发表了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短文四篇,这或许是龚育之的第一篇俄文译作。同时,龚育之也注意总结别人翻译作品的经验。如他对照俄文原版,校阅了梅益通过英译本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和戈宝权所译的版本进行对比,认为“译文通篇流畅优美,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说得上铿锵可诵”^[6]。但同时,龚育之对照俄文原版,也指出梅译本存在的篡改和删节之处,并强调,“一个忠实的译者,不应该随便删节和篡改原文”^[6]。

1.3 卧床养病时期 (1951.4~1952.10)

1951年4月起,龚育之因患严重肾炎而卧床养病,病中继续自学俄文,笔译不辍,成为他科学翻译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他主要翻译

苏联《化学的进展》、《哲学问题》、《布尔什维克》等杂志上发表的批判共振论（一种化学结构理论）的文章，还通过驻苏大使馆一位同志的帮助，拿到了刚出版的化学结构理论问题全苏讨论会的全纪录。

当时翻译的过程非常辛苦，他回忆道：“我初学俄文，开头差不多读一行就得查几次字典。我才读到化学系三年级，讨论中涉及的量子化学和物理化学的许多内容我都没学过。”^[4]一方面俄文水平有限、专业知识欠缺；另一方面是病魔的威胁，龚育之却没有放弃翻译事业，一本俄华字典就是他的武器，他“斜卧在床上、伏在几上，吃力地、认真地翻译了这批文章”^[4]。这批译作陆续发表在《科学通报》上，仅 1952 年第 3 期就收录了七篇有关“有机化学中化学结构理论问题全苏联讨论会”的译文。

引入苏联对于共振论的粗暴批判，将科学贴上哲学和政治的标签，对当时我国的科学发展带来不好的影响。龚育之后来曾多次对这段翻译历史进行过反省和检讨。但他通过翻译也介绍了一些正义的苏联科学家观点，如在苏联化学结构理论问题全苏讨论会上，有作者坚持科学的观点，强调根据有机合成的化学实践来研究结构理论，强调运用现代物理学及其实验和理论方法来研究化学结构等。对龚育之来说，通过翻译，引得他阅读了很多相关的科学著作，并拜师郭挺章研究员学习量子化学，更重要的是大大提高了他的科学翻译水平。

1.4 中宣部工作前期 (1952.10~1956.4)

1952 年 10 月，龚育之病情转向稳定，调到中宣部科学处工作。此后不但与同事合作，出版了很多化学、物理学、天文学等多本译文集，而且集中精力编译《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工作》一书，让人们了解和学习列宁、斯大林在建设苏维埃国家的过程中，怎样重视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专家。全书共 229 000 字，龚育之直接翻译的将近一半，转录的文章也都对照原文作了校对。

经过大量翻译实践，龚育之的翻译思想也日臻成熟。1953 年，他接连发表了两篇讨论科学翻译的文章，一篇是《苏联基本科学著作的翻译工作中的几个问题——评叶蕴理译布洛欣采夫著〈量子力学原理〉》（《科学通报》1953 年 1 月），另一篇是《要学会剜烂苹果——评不应该随意查禁一些含有部分错误的科学书籍》（《科学通报》1953 年 4 月），文中观点精辟独到，震惊译坛。

1.5 中宣部后期 (1956.4~60 年代初)

1956 年 4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艺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学术问题上“百花齐放”的方针。5 月 26 日，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向知识界做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陆定一在讲话中强调，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这一方针的确立，使此后我国科学界开始理性看待苏联对共振论，遗传学等方面的批判。龚育之也对之前的科学翻译进行了反思。

在收入《科学·哲学·社会》一书的《自然辩证法工作的历史情况和经验》一文中，龚育之就之前翻译苏联批判“共振论”的文章一些情况作了省思和说明：译作中“讲了苏联批判共振论时的政治气氛，也讲了后来纠正错误、批评这场批评的情况”^[7]，在收入此书的另一篇文章《自然辩证法工作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龚育之也承认“翻译介绍过对共振论的批评”^[7]。

这段时期翻译引进的文献不再局限于苏联，国外有价值的成果，都逐步而系统地出版。此段时期他还和罗劲柏等人翻译了曾在苏联受到批判的“控制论”，于 1961 年出版了《控制论》一书，尤为值得一提的是，cybernetics 早年译成“大脑机械学”，龚育之翻译为“控制论”，这种译法后来沿用下来。

20 世纪 60 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交恶，俄文科学文献的翻译基本停止。

龚育之的科学翻译思想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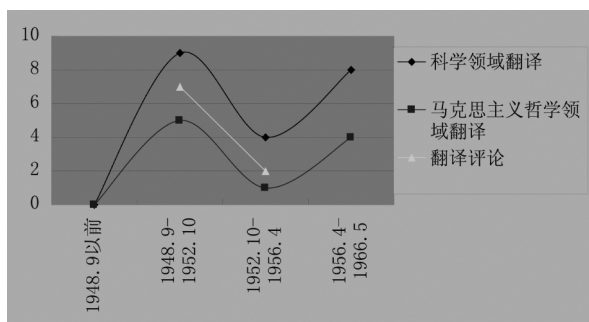


图1 龚育之科学翻译文章曲线图

(1) 既信又顺。“信”指的是“不变更原文含义、不变更原文意义的重点、不变更原文提出问题的角度为原则，做稍微的变动。”^[9]这是因为，“翻译本身要求严格，科学翻译更是如此，因而作必要的变动时应该十分慎重。”^[10]“顺”指的是“要确切地用白话文把原文传达出来”^[11]。同鲁迅的“硬译”不同，龚育之认为，如果译教科书在语文上困难很多的话，可以大胆地、逐句逐段改写，增加或去掉一些词句，改变句法语气，以不错误而又通顺为原则。

(2) 谨慎认真的科学翻译责任感。龚育之“一字不苟”的翻译态度受鲁迅影响颇深。他在《学习鲁迅一字不苟的精神》一文中写道：“我们翻译工作者应该检查自己的工作，看还有没有残存的马马虎虎，粗枝大叶，以意为之，含糊混骗，以猜测代替查考，以杜撰代替推敲……的工作态度，如果还有，就应该努力改过。”^[12]龚育之在翻译实践中勉力践行这一观点，如1957年，龚育之在辑录《苏联〈哲学问题〉（1948-1957）中有关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论文目录》，将10年中，近三百篇俄文论文的标题译成中文，并写明作者、发表时间、中译文发表处，更宝贵的是将文章按科学学科做了分类：“一般性论文”、“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并且详细注明是否译成中文、在何处发表，将标题译成中文实际上工作量很大，需要参看全文，才能避免误解误译，况且涉及的学科又多，龚育之就是凭借这种严谨态度，精益求精地从事翻译工作，值得当今广大科学翻译工作者学习借鉴。

(3) 自由的批评和争论。科学翻译作品很容易出现良莠不齐的情况，《要学会剜烂苹果》指的是读者、编者、图书管理员通过自由批评，对存在错误的译本加以校正。“剜烂苹果”同“随意的查禁”相对，有助于维护译坛批评和争论自由，推动科学翻译健康发展。

2 龚育之科学翻译思想对当今的启示

科普翻译作为科学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都深受广大科学翻译工作者的重视。伴随着我国第四次翻译浪潮，科普翻译日益繁荣，涌现出很多优秀的科普翻译作品。连续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为国家“九五”、“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重点图书的“哲人石丛书”，究其成功原因，丛书策划人之一卞毓麟以“用心”来概括。丛书中《大流感》一书的译者钟扬说：“译《大流感》我最大的体会就是要凭良心做。我们为这本书写了大约200条的脚注。一条脚注都不写，也并不影响书的质量。但脚注对更深层次理解书的意义，对科学普及作用非常大，我们义无反顾地做，因此这本书我们翻译了三年。”^[13]

但近来译坛“众分”（crowdsourcing）翻译模式愈加盛行。“众包”即通过互联网海选译者，再由多人以最短时间合作翻译一本书。这些“快餐式”科普翻译作品往往质量不尽如人意。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秦克诚在《辞海译丛》的首发式上曾批评当今图书的翻译质量：“最近学会从网上购书，就买了不少科普书，但有些书实在没法看、看不下去，翻译质量太差了。”^[14]方舟子在《科普翻译还有救吗？》一文中，对田洛的译作进行了校对，表达了对当今科普翻译著作质量下降的忧虑。

糟糕的快餐翻译作品不仅浪费了资源，还误导读者，和快餐一样毫无营养。翻译不是一蹴而就、可以“快餐”的事情。要改进当前科普翻译“快餐化”中的问题，不妨借鉴龚育之先生的翻译思想。

首先，加强译者修养。根据龚育之的科学翻译思想，译者修养和素质表现在两个方面，

（下转第94页）

社会氛围,减少各类网络迷信导致的心理污染;(2)截断网络迷信信息向青少年传播的途径;(3)丰富校园心理咨询形式,提供多元化的心理服务,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4)将青年人心理科普工作与他们的思想道德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总之,对于处于思想剧烈变动期的青年人来说,要以科学精神来引领他们的人生。让青年人通过学习前沿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掌握最新的科学思想,揭示并认知科学的本质,正确地运用科学技术成果,才能辨别各类形式的迷信、非科学、伪科学、假科学和反科学的欺骗和迷惑。不仅如此,青年人更应通过涵养道德,陶冶性情,积极跃升至求真、尚善、致美的人生境界,这样才能有效地控制、摒弃网

络迷信的负面影响,减少它们对社会的危害,才能真正走上一条正确的、有意义的人生道路。

参考文献

- [1] 文婧,李依萱.“星座迷信”在青少年中蔓延的现状初探[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84-85.
- [2] 周得华.论高校大学生现代迷信现状及其对策[J].出国与就业,2011(18):100.
- [3] 李醒民.科学的文化意蕴[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16.
- [4] 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M].李珩,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84.
- [5] 刘连忠,徐汉明.迷信存在的社会心理因素分析及干预对策[J].医学与社会,2005,18(12):40-41.

(责任编辑 谢小军)

(上接第89页)

一是有良好的外语知识和科学背景,能将原文的思想恰当地表达出来。二是有良好的译风。对于科普著作翻译,往往会让人误解为道理浅显、语言简单,结果导致译者译文的科学性有待商榷,或是文字晦涩不通,贻误读者。

其次,合理利用翻译资源。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翻译资源贫乏,只有查阅字典或请教别人等简单方式。现代网络信息发达,科学翻译资源打破了时空、地域界限,实现了远程查询、及时传播、下载存取及分析利用的一体化。译者可掌握的资源虽多,但不应当丢失龚育之等老一辈翻译人员所倡导的优良译风。译者应当在合理利用网络翻译工具的基础上,透彻理解上下文关系,灵活处理文法和字意,反复审阅,使之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对专业性较强的词汇,可以建立网上术语库,有疑问的术语及时咨询相关领域专家,确保翻译的科学性。

第三,要学会“剜烂苹果”。科普翻译书籍出版前,应本着一字不苟的态度,反复校阅。对待存在错误的“快餐式”科普翻译作品,形成良好的批评风气,不因噎废食,也不随意查禁,只有这样,才能推进我国科普翻译事业的不断发展。

致谢 写作过程中,龚育之的夫人孙小礼先生向我们提供了很多资料,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在此向她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 [1] 雷普文.走近龚育之[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
- [2] 黄非(龚育之笔名).评薛译《普通化学》[J].翻译通报,1950(10):25-27.
- [3] 黄非.对教科书中译工作的几点意见[J].翻译通报,1951(1):24-28.
- [4] 龚育之.龚育之自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 [5] 卢弓(龚育之笔名).俄文学习在清华[J].进步青年,1950(2):31.
- [6] 黄非.评梅益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J].翻译通报,1950(8):15-19.
- [7] 龚育之.科学·哲学·社会[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
- [8] 龚育之.苏联基本科学著作的翻译工作中的几个问题——评叶蕴理译布洛欣采夫著《量子力学原理》[J].科学通报,1953(1):85-90.
- [9] 黄非.学习鲁迅一字不苟的精神[J].翻译通报,1951(9):35-39.
- [10] 李芸.哲人石丛书:注重“额头”的科普[N].中国科学报,2012-04-22(B1).
- [11] 麻晓东.《辞海译丛》:一个坚守的诺言[N].科学时报,2011-11-18(A7).

(责任编辑 谢小军)